

#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五）

江燦騰

可是，對於上述的華僧或臺僧的際遇，淨土宗的日僧橋本聽了之後，在輕視中還能帶一絲絲物傷其類的同情之心。反之，當時正在大肆收編臺人寺廟的佐佐木珍龍本人，則不但泰然自若地駐在艋舺臺人最豪華壯麗的龍山寺裡，在其《從軍實歷夢遊談》中，居然還用鄙視的眼光，來提到下列他所謂「大多屬『曹洞宗』法脈」的本地僧侶和信徒：

1. 臺灣僧侶的「頭髮剃得很漂亮，脫下法衣之下的服裝卻和支那土人之服幾乎沒兩樣，和普通人民之服裝沒什麼不同，在上面卻又穿著和我日本黃藥宗相同之法衣。」

2. 臺灣僧侶「一般而言，並無通曉知識的僧侶。」「可稱得上有學問的沒有。」「沒有智慧的有七成，無法誦經者也占了半數。」

3. 「對臺灣寺廟來說，買紙（錢）給寺廟，可以說相當於日本之賽錢之意味。」

4. 臺灣佛教信徒「並不信奉佛教之教理，對於儀式的、習慣的部份卻信奉不已，因為歷代祖先敬奉佛祖，而不得不跟著敬拜，到寺廟無論是燒香還是點蠟燭一定要燒紙錢，有這樣觀念的存在。」「必須祭拜時，以拜觀音為例，會點上線香或蠟燭並獻花，在這樣的環境下，因為是仰賴佛祖之冥助來定契約，所以若毀約則會受到佛祖的冥罰，有這樣的說法。」「若在借錢之期限內未還，將會受到佛祖的冥罰，為了不受佛祖的冥罰，而在期限內還錢。」「支那並無好的醫術，於是，大多的患者是到廟裡求籤，當成藥喝下去。」

對於類似佐佐木珍龍的批評，其實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即到龍山寺拜觀音的信徒，正如百餘年後的今天，大多數並非嚴格意義之下的佛教徒，而是屬於民間信仰的祭祀方式，故既非專屬曹洞宗系統的禪寺，也不能苛責什麼。再說，假如佐佐木珍

龍上述所批評的，全屬事實而非有意輕視，則其本身或其他日僧，除非不再繼續對臺人佈教，否則其接續即將面對的，其實是一樁更為艱鉅的宗教改造工程，亦即其本身或其他來臺日僧，既經大本山決定由彼等繼續在臺對臺人佈教，則彼等此後究竟要如何改造臺人原有的佛教信仰形式？或如何提升其信仰內涵？將是一場既漫長又艱困的現實考驗！而此一問題，就是《教報》第一號創刊所要傳達的佈教意願與策略，但究竟其真相如何呢？

其實所謂的《教報》第一號，即是因應「大日本臺灣佛教會」組織的成立，所創刊的機關刊物，故所表達者，即「大日本臺灣佛教會」此一組織共同的基本立場。此所以在其〈發刊之趣意〉一文中，雖雄辯滔滔，筆力頓挫有致，相當精彩，但最後除強調這是代表日本佛教發言、非個別宗派意見，及秉持報導客觀公正的原則之外，主要仍歸結為兩大責任之承擔，一為針對新（臺灣）同胞的感化之必要，二為提供渡臺（日本）同胞的安心之必要<sup>2</sup>。於是，針對這兩大責任之承擔，以「社說（論）」的方式，提出其〈對臺灣佈教策私見〉的長篇陳述。但整個論述的主軸，乃是環繞著身為「宗教家」於「國家（日本）」因對外戰勝而取得

臺、澎等島嶼為新殖民地之後，其「宗教的弘法感化」與「國家民政措施」必須兼備方能奏效的角度來論說。這當中有極周詳的臺灣現有宗教形勢的觀察和深刻的民族心理學分析，而作為日本宗教在臺傳播最大勁敵的白人耶穌教，自然也在評估之列。此外，其他的論述還很多<sup>3</sup>。因此可以說，像這樣深刻的論述和評估在臺如何佈教之種種意見，應非一般的來臺日僧所能勝任，筆者判斷其中可能有日本國內的專家參與構思，否則很難達到這種水準。但，不論如何，此篇宏文表達了當時日本宗教界最坦白、也最強而有力的「宗教家」角度觀察及其與「國家」統治功能的必要分工。可是，日本在臺灣民當局能聽得進去嗎？或者，如有一「公私相剋」的問題產生時又將如何呢？

如果，根據《教報》第一號的相關資料來分析，問題其實已經浮現了，因「社說（論）」上的陳述意見並非未雨綢繆或無的放矢，而是有針對性的。例如《教報》第一號上的另外兩篇文章：未具名的〈國家と宗教家〉一文和布躬身的〈前宰相伊藤侯の宗教教談を評〉一文，除了呼應「社說（論）」上的陳述意見之外，主要是針對當時日本政壇的權威人士伊藤博文，在一次對《日本新聞》

第2489號的談話中，曾約略提到日本國民的教育，還是從純理、學術，及直覺的實證來著手為宜，因學術對國家來說是能超越宗教的迷信之上的，而佛教與耶穌教難道不是一種迷信嗎？否則為何日本國民採信後反而導致國民的生活更加薄弱？故他認為期待藉「宗教」了生死的本位心理，對全體國民的生活來說，是不必要的，亦即國民生活的充實，是不能期盼由宗教主觀性的超越心態來達成的<sup>4</sup>。但，如此一來，固然對已被視為「非宗教」的「國家神道」沒有影響，卻對一般「宗教」產生極大的殺傷力，因其已使「宗教」（包括佛教、耶穌教）在國內體制內教化功能的必要性和積極面的立場，或有為之動搖和崩潰之虞。所以《教報》第一號上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甚至具名提出反駁），不但想對此談話的不利影響加以緩和，更進一步的作法是想將其扭轉過來，因此在態度上才會如此聲嘶力竭地在文章中極力訴求著。然而，這樣做在實際上有效嗎？的確是頗值得繼續加以觀察的。

但，追問此一問題以前，有必要先了解官方在臺初期真正的「同化政策」究竟是什麼？因這涉及日後有無留給日本佛教各宗派在臺參與及發揮的佈教空間？雖然過去在研究上，也曾有學者跳過這

個問題<sup>5</sup>，只是單就統計數字的多寡或升降來說明日僧在臺的成效如何、究竟是什麼；但如此論述畢竟只流於浮面的表相，對於事件產生的「為何」問題，未能有較深層的原因解答，不能說是理想的研究方式。故此處接著應先就官方在臺初期真正的「同化政策」究竟是什麼？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然後再回來檢討日本佛教各宗派後來在實際上的佈教策略轉型與教勢發展的問題。

## （二）有關在臺殖民統治初期「同化政策」的釐定問題

### 1. 過去學者對此問題研究成果的概述

由於此處所要說明的，主要是在究明有關在臺殖民統治初期的「同化政策」的真正內涵，以了解當時在新來的異文化殖民統治架構之下，官方以何種認知的角度來擬定或經辦日僧與臺灣舊慣佛教關涉的事務。所以，必須仍回到當時實際的釐定過程來觀察。

因在當時，織田萬和岡松參太郎所承擔和其後完成的龐大相關著述，都只是純就臺灣舊慣調查的現象資料，來進行所謂「臺灣私法」的「法制化」體系之建構和學術性的精細解讀，並不涉及有關在臺殖民統治概念的建構或政策擬訂，因那是屬於中

央政府和臺灣總督的決策範圍，並非彼等職責所能置喙的。事實上，岡松和織田萬兩法學專家雖各自提供了龐大有用的基礎資料，但這些皆屬為決策者做判斷之際，適時提供所需相關背景知識的前置作業罷了。這宛如「現代超級市場」雖提供了各種精心處理過的新鮮料理材料，可是選購的顧客到底要如何烹調？或欲煮成何種適合自己口味的佳餚？「現代超級市場」的提供者，是既無權也無從完全代其做決定的。同樣的，在臺殖民統治的政策，到底是要寬鬆或緊縮？乃至對殖民統治後日臺民眾的信仰內涵，究竟是要逐漸趨向融合或依舊維持差異？也是必須完全交由當時官方的實際決策者來決定的。換言之，上述的前置作業，若無實際擁有宰制的公權力為後援，則只能屬學術層面或輿論影響的範圍，因此不應將其與前者具有官方實際決策權力的不同性質混為一談。

在另一方面，更關鍵的問題是，有關日治初期殖民統治的同化概念，其真正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在當時並不是很明確，而只是逐步視情況的演變和需要，然後才在相關政策上進行必要的調整。因此今人吳文星在其《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一書中，即曾提到下述的變革情形，他說：

1. 日人治臺，以逐步強化的同化政策為其統治方針，因此歷任總督的施政方針由標榜「無方針主義」進而明揭「同化主義」，由揭櫫「內地延長主義」進而強調「皇民化政策」。易言之，同化政策逐步強化之目的，在於不僅僅改變臺人成為「順良的日本人」，尤有進者，企圖使臺人變成「利害與共的日本國民」。

2. 為貫徹此一政策，日人講求各種措施，諸如「改風易俗」、「易服改曆」、「破除迷信」、「國語普及」等，不一而足，藉求改變臺人的語言風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及社會組織。其中，尤以「國語普及」最為重要。<sup>6</sup>

並且，在同書中作者又提到：「日據時期是臺灣社會的轉型期。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臺灣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人口結構、思想文化，乃至風俗習慣，均產生重大的變化，逐漸由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度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固然此一社會文化變遷大多是隨著技術、經濟、觀念、文化傳播等因素之改變，而逐漸地、不知不覺地演變；但無可否認的，有不少變遷明顯的係以社會領導階層為主導，以民間團體為運動的主體，有組織、有目標、講究方法策略且持續性地提倡和



鼓吹，由是而獲致預期的結果。」<sup>7</sup>這樣的論斷，正如同作者在之前有關「同化政策」的變革論斷一樣，是綜合整個日治時期的長期現象來描述和解讀的，既精確又明白曉暢。

但，如純就該書作者思考的角度來看，則本章以上所引後面一段的內容說明，似乎主要在於欲藉其書中第五章（以放足斷髮運動為例），來觀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相互關係，卻不一定與日本在臺殖民當局所欲遂行的「同化政策」有關。此因在同書中，事實上是直到第六章時，作者才「以『國語普及運動』為中

心」，來觀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與同化政策」的相互關係，故在該書中的「社會文化變遷」與「同化政策」兩者之間，並不太有直接的關連。當然，筆者在以上的引述和此處的有所評論，並非專注在質疑該書作者的相關論點<sup>8</sup>，正確來說，其實也只是想藉著該書作者上述兩處引文中的論點，來作為本章底下將進一步討論的相關線索罷了，此外無其他用意。但在展開討論之前，此處有必要先將當時幾本較重要討論在臺殖民政策的相關著作系譜，與上述吳文星所描述的「同化政策」發展階段的相關繫年，作一對比簡表如下：

決策年代	決策總督	殖民同化政策內容	著書年代	著書者	書名
1898	兒玉源太郎	無方針主義	1905初版	竹越與三郎	臺灣治績志
1898	兒玉源郎	生物學原則	1912初版	持地六三郎	臺灣殖民政策
—	—	—	—	東鄉實 佐藤四郎	臺灣殖民發達史
1918	明石元二啟	同化主義	1916初版	後藤新平	日本殖民政策一斑
—	—	—	1921初版	柴田廉	臺灣同化策論
1919	田健治郎	漸進內地延長主義	1923初版	矢內原忠雄	殖民及殖民政策
—	—	—	1926初版	增田福太郎	臺灣的宗教
1935	小林躋造	皇民化運動	1939初版	白井朝吉	—
—	—	—	1939初版	江間常吉	皇民化運動

「同化政策」發展繫年的資料來源：參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從以上兩者對照的簡表來看，日治初期有關殖民政策的擬定，其實是要到第4任（1898.2～1906.4）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開始，才有比較清楚的指導原則<sup>9</sup>，並且此後一直到1935年第17任（1936.9～1940.10）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推行激進的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之前，基本上都是以漸進的方式來處理臺人的同化問題。

然而，有關「臺灣殖民政策」在何時做決策？與有關「臺灣殖民同化概念」的如何釐清？既不同時，也非屬同一回事。因此，有必要再回頭來，針對日本在臺的「殖民同化概念」，作一些溯源及其後續發展的相關探討。（未完待續）

#### 註釋

1. 轉引松金公正的譯文，見氏著〈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佈教使眼中的臺灣佛教——以佐佐木珍龍的《從軍實歷夢遊談》為中心〉，《史聯雜誌》第35期，頁27-29。
2. 鹿山豐編，《教報》第一號（1896.11）。頁1-4。
3. 同上註。頁4-9。
4. 類似的看法，後來亦出現在伊藤博文訪問歐美的隨員「鍋島外務書記官」的一次外語談話中，認為歐美地區伴隨「唯理學」的發達，逐漸使該地區民眾的「宗教心」轉趨薄弱，因此，就其所見，近20年來，歐美國民在星期日上教堂祈禱的昔日盛況，的確已在大幅度的轉變中。見曹洞宗務文書課《宗報·雜報》第19號（1897.9）。頁13。
5. 此處主要指日本學者松金公正的研究。
6.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305-306。
7. 同上註。頁247。
8. 事實上吳文星在處理「國語普及運動」與「同化政策」的背景解說部份，相當精彩，頗值得參考。
9. 持地六三郎認為日治初期的殖民政策之確立，是在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代。見氏著，《臺灣殖民政策》（東京：富山房，1912），再版，頁4。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的是，後藤新平本人既是在臺灣殖民政策的確立者之一，以及在其書於大正10年（1921）結集多年講稿出版之前，已曾多次發表關於滿州與臺灣殖民政策的講演記錄，故應與表上第一本竹越與三郎的著作同期看待。